

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最初构建

——日本《现代中国语学》(1908) 的意义

李无未 李 逊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后藤朝太郎《现代中国语学》(1908) 是日本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早系统建构现代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著作。它从对重实用、轻理论倾向不满开始,认为只有系统建构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才能使汉语研究真正进入到一个科学的境地。“序论”对汉语特质、汉文字和汉语的关系,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汉语现状加以讨论。“本论”是核心部分,对汉语标准语、北京官话音韵、北京官话语法、口语和文体语比较、汉语方言分布及特点等进行论述。“结论”论述了现代中国语的发展趋势,以及对汉语进行历史观察的必要性等问题。重新认识《现代中国语学》在汉语语言学史上的学术价值,评估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汉语语言学史研究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对今天建立科学的现代汉语语言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现代中国语学》(1908); 日本; 清代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 汉语语言学史

中图分类号: H10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2014)01-0060-11

日本著名学者仓石武四郎(2013)认为,后藤朝太郎《现代中国语学》(1908) 是日本最早从现代语言学科学角度建构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著作,因而在世界范围内汉语语言学史中地位十分重要,研究它,意义重大。^[1]

一、《现代中国语学》的产生与其著述意图

仓石武四郎提及日本明治时期东京大学语言学新气象的时候,强调了《现代中国语学》的“汉语语言学”价值。钱婉约在界定“汉学”的内涵时指出:“日本汉学的基本形态是:以中国文化为母体文化,通过直接阅读汉籍的方式来解读和阐释中国古代儒佛等文史典籍,并用汉语书写研究成果;在价值评判标准、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以及审美情趣等方面,基本采取与母体文化趋同的方式,表现出对于母体文化崇尚或趋同的心态,并将这种文化引入到了日本文化生活中去。”^[2]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汉学”表达形式不应仅仅局限于用汉语书写研究成果,也应该包括用日语书写的研究成果,这样就符合当时研究的实际了。汉学意义上的汉语语言学,应该是指以中国“小学”和日本传统“国文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汉语语言学的成果,比如汉唐朴学、清代考据学的方法,以及日语与

收稿日期:2013-09-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12&ZD178)

作者简介:李无未,男,吉林敦化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逊,男,吉林延吉人,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教师。

汉语等语言进行比较而形成新的“国语学”研究手段。^[3]而仓石武四郎所说的“语言学”,是指西方语言学学理论传入日本后,在西方语言学理论观念观照下研究汉语的现代语言学意识,是现代意义上的自觉的汉语语言学理论体系建构。

东京大学现代语言学建立,是与上田万年等人引入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日本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分不开的。上田万年(1867—1937)1894年从德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就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首任博语学(语言学)讲座教授,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音声学等十分先进的理论体系,以其科学性和批判性,强烈地冲击了当时日本国语学界旧的语言学研究思维模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导了日本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向,从而开创了日本一代语言学新风。他所培养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日本最为有成就、最负盛名的语言学家,比如新村出、桥本进吉、小仓进平、伊波普猷、金田一京助、龟田次郎、后藤朝太郎等人,形成了具有现代语言学意识的最有影响力的日本东京大学语言学学术流派。

后藤朝太郎(ごとう あさたろう,1881—1945)在东京帝国大学受业于上田万年,是日本明治时代后期至昭和时代前期的著名汉学家、语言学家。他涉猎中国学的学术范围非常广阔,不仅有中国语言学、中国文学,还有中国民俗学、中国艺术学、中国地理学等学术领域,成果数量十分惊人。在昭和初期,被称为日本“中国通”第一人。他是日本人中对中国大陆各方面情况最为关心的学者之一,其著书、编书超过110册,主要著作有《汉字音の系統》(六合館,1902年)、《文字の研究》(成美堂書店,1910年)、《文字の沿革》(成美堂書店,1915年)、《中国風俗の話》(大阪屋書店(大空社,1927年)、《南洋の華僑》(高山書院,1942年)、《文字史》(高山書院,1943年)等。^[4]

他的《现代中国语学》,由东京博文馆1908年发行,被列入日本帝国百科全书之中,一直被作为经典性的汉语语言学著作而受到历代语言学者的推崇。该书包括《自序》、目次、正文。正文有286页,分“序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分别对汉语概念、民族和汉语的关系、汉语的特质、文字和汉语的关系,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汉语的发达、汉语的现状等方面加以讨论,涉及到中国标准语、北京官话音韵、正字法、单缀音构成、四声、同音语、北京官话文法、中国语方言发生、分布,各区域方言特点、中国语和同族语比较等内容,论述了现代中国语发展趋势、中国语历史研究必要性等问题。

后藤朝太郎在该书《自序》中充分表达了《现代中国语学》的著述意图,有意识地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系统建构汉语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作者认为:其一,在当时的日本,中国语研究非常兴盛,应该属于“东洋语研究”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但是,值得考虑的是,明治时期所谓的“支那语研究”,仅以实用为单纯目的,实用“支那语”课本复杂多样,特别是教学法,还留有研究余地。其二,对中国语进行真正的研究,单纯从实用方面观察,还不能说是很充分,需要更进一步从中国语学术方面揭示真相。对中国语进行学术研究,从语言学基础角度科学地观察中国语,完全是从前人未曾开展的事业着手,反而愈加埋下了“多重疑问”的种子。毕竟中国语是语言学界有待于解开的一大疑团。其三,必须先要依据独逸(德国)、ガベレンツ(G. V. d. Gabclentz)、アレント(K. Arendt)、英国吉利斯ワッターズ(T. Watters)、中国的马建忠等的研究,但无论他们是谁,都不能不说存在着深奥之处。其四,进行中国语学术研究,依赖于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金石学、土俗学、人种学等辅助性学术知识,可以完成语言学大业,这是有效解决语言学方面问题的独有途径。这可以算是对20世纪汉语学术研究未来的一个展望。其五,作为一门学问,中国语言学的确立,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中国语音韵组织结构、语汇、文章法、语系等各个部分的研究一定要很充分。然而,这种研究几乎不能全部都顾及到。作者对该书感到不满足的是,把音韵作为主要论述的内容,造成了其他方面研究的缺憾。其六,本书叙述的范围,多限于现代,而有关历史的汉语研究很少论及。其七,对中国语历史研究今后要加以重视。这里就北京官话现状以及它与各地方的比较,但还仅止于概说。其概说的结构以及顺序,也确实让作者煞费苦心。

由后藤朝太郎《自序》可见,《现代支那语学》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第一本从现代语言学角度系统建构中国语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著作。与当时盛行的现代中国语应用研究,比如一般中国语教学旨趣完全不同,作者希望在前辈学者,比如 G. V. d. Gabelentz 和 K. Arendt, 以及 T. Watters、中国马建忠等成果基础上,在新的 20 世纪,以此为契机,形成成熟的现代中国语学理论体系。作者所占据的学术前沿位置,以及所具有的前瞻性学术眼光,确实不一般,登上了当时世界现代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建构的高峰。

二、《现代中国语学》“序论”基本构架及理论意识

(一) 汉语概念

关于汉语名称,后藤朝太郎说,汉语语言学建设迫在眉睫,但头绪凌乱。用汉语一词不足以概括中国之语,所以,就称为中国语。在中国地域内通行的语言,有所谓中国语、蒙古语、满洲语、西藏语等。在中国占有优势地位,通行于中国的汉语,就是所说的中国语。

后藤朝太郎强调从两个方面观察汉语。一个是汉语的实用价值。比如商贸交通等,类似欧洲各国之间语言沟通关系。二是从学术研究方面的观察,称为“中国语言学”或者“中国语学”。现今一般“中国语学”成了单纯地练习汉语发音,理解“暗颂”、练习会话。这里的“中国语学”,以学术研究为基础,对语言事实进行科学的分类,观察存在问题与现象,并给予切合实际的说明,既可以适用于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的沿革研究,又适用于地理上的、各地方方言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因此,本书以“现代中国语学”命名。汉语研究存在着实践的和学术的两个方面。实践,必须以丰厚的学术素养为必要条件;学术,以拥有实际的素养为根本条件。因此,对汉语进行全面而科学的研究,以汉语实际为前提。因为“同文”,使得日本人具有先天的优势研究条件。

关于汉语研究学术进展,后藤朝太郎认为,一些学者之所以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国语,就是因为“身在此山中”。尽管外国学者也容易陷入到“谬见误断”的境地,但却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到别国语言的“奇拔崭新”。中国人没有确认汉语实际的价值,耽于小学之余事,但外国人观察眼光完全不同,首先对汉语实际应用价值进行了确认。例如已经刊布的著作:福岛安正著《四声连珠》、伊泽修二著《官话韵镜》、郑永邦、吴大五郎著《日汉英语合璧》、Karl Arendt: Nordchinesische Umgngssplnche \ Thomns Wnde: Yu-yen Tzu-erh=chi. with Key to Tzu-erh-chi. etc. 等,有数百种以上,当然还是以实用为目的。与此相反,以语言学学术为目的的汉语研究则显得幼稚,学术研究的时代还未到来,明显处于资料汇集的准备阶段。欧洲语言研究历经百年才完成了基本的学术准备,不可贪一朝一夕之功,特别如汉语语言学研究,以一个世纪为时间单位尚且感到准备不充分。后藤朝太郎认为,有两本现代汉语研究成果值得一提:H. A. Giles 《华英字典》(1892) 和小川尚义《日台大辞典》(1907)。《华英字典》比较驳杂,而小川尚义《日台大辞典》值得推重。《日台大辞典》卷首揭示了中国各地方语音比较研究的一些情况,卷末所附台湾地名用类推的理论归纳了一些规律,是有关“南清”语言研究的“不二辞典”。有关北清语言方面,除了《华英字典》之外,还没有真正语言学科学成果出现。古代汉语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的俞樾、王先谦、孙诒让,以及日本的星野博士、白鸟博士、市村博士,欧洲学者有 Chavande、F. H. irth。但他们学术方向往往以经学、史学、文学为主,语言研究是次要的,属于文献学的语言学研究,还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语言学研究。所以,现代中国语语言学研究还处于准备阶段。

(二) 中国民族和汉语的关系

关于中国掌权者和汉语的关系,后藤朝太郎认为,通览中国三千年历史,手握天下主权与其说是汉民族为主,不如说是北方民族为最多。即便如此,北方民族在语言上受汉族影响至大,语言融合迅速。

在语言和种族关系方面,比如满族有很多人不会满语,说明人口迁移与语言变化关系密切。

(三) 汉语的特质

关于中国文体的特质,该书首先观察其外在形式。与其他语言比较,中国语单缀语为多,语序与英语类似。“泰西”学者认为汉语的外在形式概括而简约,宛如语言发展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这只是西人之见。以文法形式饶多作为衡量语言是否成熟的标准是令人怀疑的。汉语单缀形式丰富,应该是语言上的特色。

在单词特色方面,语言的生命存在于文体之内,汉语有单缀音,与印欧语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音义结合,存在着语根形式。

(四) 汉语文字和汉语的关系

后藤朝太郎认为,文字是彰显思想的语言符号,语言依据语音诉诸听觉,而文字诉诸视觉。感知于耳而把语言之音变为形式的,称之为文字。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文字的历史。

中国文字构造体系有其内在规律。理解字形和字音之间关系,音符是关键。中国文字有过“象形义字”时期,这之后就是“绘音文字”时期,即可称为表音时期。此时文字一方面要考虑意义要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音韵上的要素,兼而注意到会意的要素。今天一般称之为形声文字。还有假借文字,完全失去了“象形义字”性质。如此,到了后来就是进入到完全表音的时期。这是中国文字发展的三个时期。

关于汉语研究和中国文字的关系,后藤朝太郎认为,以汉语言历史变迁为主研究,文字文献是其中的重要材料之一;从地理角度研究,现代汉语语言是主要对象。无论是实用的汉语教学,还是学术的汉语研究,都要依据文字。但文字不是语言,由语言而观察文字,文字宛如死去的语言。从学术角度观察现代中国语言,文字反而成为障碍。从音韵角度研究能很好地把握中国文字,这是事实。但现代汉语研究则不一定。不依赖文字而进行纯语言的研究才是最需要进行的研究。后藤朝太郎认为,中国没有产生过纯粹的现代汉语语言学著作。不能过分看重文字上的语言研究。比如同音词研究,通过设计表音符号,像伊泽修二《官话韵镜》那样,表示“真音”就很恰当了。

(五) 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

后藤朝太郎认为,语言和时代的变迁一样,也是不停地变化。今天的汉语和康熙乾隆当时的语言,从音韵等方面来说已经有所不同,而康熙乾隆当时的语言又和元明时代语言有所不同,特别是元明语言状态,与唐宋语言状态相隔甚远。人们还是要追问,上代语言状态如何?文字未制作时代语言状态如何?用古代语言书写的“雅语”和“颂”,后世人视之为卑俗之语,称为“腐败语”,但后藤朝太郎认为,却可以从语言的眼光来看,它是具有生命力的语言,让人感受到了历史的变迁,语言的发达。在西南幽谷之地通行的原住民语言,源于周末先秦语言,殆无可怀疑。从中国文献观察,剔除人为修饰加工成份,也可以发现单缀语的变化。汉语发达痕迹始于竹帛记载,比如通过《诗经》《尚书》等最古老文献可以了解一些中国语原始状态,但更多的情况却无法确认。把单缀语看做是中国语特质,与文体单词的构成法上,即语言学所说的“着添语”“漆着语”有着很大的区别。比如助词,在最古老的钟鼎金石文文献上已经起到了语法作用,到了后代语法功能愈益发达。汉语语言表现的状态是语词独立性强,语法关系并不密切,被称为孤立语。

关于汉语现状,因为“同文”,由日本人立场动态观察汉语就很容易理解。但文字不是语言。现时汉语从语言的立场观察是有生命力的,为对话之用而思维的,一定区别于“笔谈”之用。现时汉语外在形式是音韵,其内容就是意义。在现时中国通行的是“时文”,但这只是文体语,而不是口语。汉语口语,属于汉语一种,但其存在的形态确是千差万别的。像社会阶级的差别,比如北京城内,据称通行八种北京语。由此可见,汉语现状,具有多样化的发达程度。后藤朝太郎认为,单纯从地理角度上观察汉语,比如汉语语言标准是什么?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如何?其语言内部问题,比如音韵法如何组合的?文法如何表现的?汉语口语与文体上差异究竟表现在哪里?语言外部问题就

需要运用比较的方法进行。

三、《现代中国语学》“本论”基本构架及理论意识

“本论”是本书的核心部分,主要内容有十章。

(一) 汉语的标准语

后藤朝太郎认为,中国没有固定的一个统一语言标准,各省个地方,往往以土语为“通用语”,超越区域相互理解的语言很少,这就是作为国语的“北京官话”之所以在中国存在的理由。如果把北京话当做中国国语标准语的话,北京话称为官话就比较稳妥了。北京官话作为一种名称,其官话意义就有种种说法:有的认为,是指“中流社会”以上的通用语;有的认为,是官吏使用的语言;有的认为,指的是“北清语”;还有的认为单纯指北京话之义。特别是西人,由“官”字表面意义,就把官话解释为“官吏语”。西人翻译就往往从“官吏语”角度出发而出现种种译名。其实,官话之名的“官”字真义,公也、共也。比如把公路叫官路、公厕叫官厕。所以,官话就是公话,这里的“官”,是公众、一般之义。

一般人所说的汉语,指海内语言,包括南方“土语”,也包括移居海外人所操移民语言。北京官话伴随着“殖民思潮”(后藤朝太郎语),也浸染了南方语言。南方土语在中国本土的势力究竟如何?其风靡北部中国能力及其影响范围还是有限的。现今北京官话的趋势如何?对各地方的影响情况如何?答案完全超出了预想之外。北京官话通行十八省,分布极其广泛。但为何分布如此广泛?北京官话性质如何?这应该是必须关注的问题。

(二) 北京官话音韵

第一,语调。音韵一般以单音节词为关注点,但它的生命并不依据单音。独特的连续音读现象,是中国语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汉语,存在文体上的语调外,更有语词上的语调。语上的语调显示在文体上存在着独立状态,可以观察到。在各种类型语言中,谈话中的“话节”,往往因谈话停顿而气息之节断绝。汉语是单缀语,反而在一个“气节”之间,包含了两三个“话节”。在北京官话音韵中,最高的语调处于哪个位置呢?音调和语调的形态存着怎样的关系呢?对这些问题必须做最精密的观察。比如:那个桌子 na ko cho tsze;桌子上 cho tsze shang;在桌子上 tsai cho tsze shang。“桌”音语调,哪个高,哪个低就比较清楚了。

第二,北京官话各个音节及其正字法。在中国语中,“各音”性质如何?如何按照正字法规定观察语音?比如元音和辅音。北京官话单元音10个,其中还有长元音和短元音、语尾音。还有二合元音(华)、三合元音(渊元)等。概括起来就是:单元音、二合元音、三合元音。北京官话辅音,一般用罗马字表示。参照伊泽修二著《官话韵镜》,比如“破障音”(破裂音, ktpdtotstʂ)。除了浊音之外,还有所谓的“缀音”,比如带有强烈的“呼气”之音,即“有气音”(送气音, k't'p'to'ts'tʂ)。

第三,单缀音(音节)的构成。元音和辅音结合而构成缀音(音节)规则,比如 i、ü 元音在北京官话中不能和 k 辅音相结合;h 或 f,也不能和 i、ü 元音结合。还有所谓二缀音、多缀音等。缀音总数达到了405个。

第四,四声之别。汉语音节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同一个音节但声调不同,也使得音节数量大增。或缓或急或高或低仿佛音乐上的音调,区别很大。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音调的区别,北京官话叫四声之别。北京官话四声种类有:上平、下平、上声、去声。对四声的学术机理之论,用音乐之符号可以说明:上平,音调升降上下,完全决定于平音,有余韵。下平,音调是短急之音,几乎没有余韵,音调显著上升。上声,音调深且长,余韵渐次向上并且舒缓,如长长叹息出气之音。去声,音调初始很长,但其余韵突然间急转直下降了。后藤朝太郎强调,但在实际谈话之中,音调并不如此固定,比如上声就变为下平,还有上+上(去)。今天,我们则称之为汉语连读变调。在汉字的四

角按加上数字表示四声。

第五,同音语。把原音语音相同,词形不同,缀以四声,可以识别。但词形完全相同,因意义不同,就用不同声调表示。比如:你好;他好喝酒。两个“好”,词性、意义不同,就分别用“上声”“去声”符号表示声调不同。但还有意义不同,声音、声调完全相同的,比如:大意、上房、妻子、看书等,通过轻重音等办法来表示区别。

(三) 北京官话文法

第一,语序。后藤朝太郎认为,用“泰西”文法准绳去观察“东洋语”不合适的,必须以“东洋思想”理解才能获得。如果对汉语进行如“主述”“就述”洋语式分解,就把句子分为两部分,那“主述”“就述”之间关系语能否确认就存在疑问。对中国语用西方的“品词”加以区别,但在形式上,有一些词,是形容词还是动词呢?没有了“品词”区别的语词“连续”(连接)的语法形式,其意义如何在文体上加以表现呢?应该说,其完全依靠的是语词排列形式,与称为“语序”的洋语并没有直接关系,这就成了中国语发达的独特之处。问题主要是:1)在汉语中,把心理感念放在第一位。比如“有什么事?”“有什么事。”这两句以是否存在感念为前提。2)时文表现疑问的方法,以一般的语词表示“主述语”表示时间的疑问词就非常重要。比如“现在几点钟?”。3)主述心理。表现动作的潜在心理,是汉语独有形式。比如“得叫(买)煤了罢?”

第二,品词区分是否合适。把汉语语词全部按照“品词”来区别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部分地区分。如以四声区别:衣,有名词(阴平)、动词(去声)之分;好,有形容词副词(阴平)、动词(去声)之分。又如以送气不送气区别:长 $t\zeta aŋ$ 为动词,长 $t\zeta' aŋ$ 为形容词;重 $t\zeta' uŋ$ 为动词,重 $t\zeta uŋ$ 为形容词。抛开单音节词历史沿革因素,现在许多词本来词性并不明确。名词兼动词,动词兼形容词、副词的很多。很难区别单音节“品词”,但双音节词却往往可以得到确认。

第三,数词。北京官话数词特点是汉语数词和名词兼用。比如复数的表示:人的复数是人等,马的复数是马匹。还有不定的意义,如:许、好些个、所有等,数词非常发达。

第四,代名词。1)人称代名词。与日语一样,汉语可以省略人称代名词,但一般情况下不可以。汉语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比如我们,表示包含自己及自己的方面。咱们,就不一样。虽然是“我们”之义,但也包含了对方一侧的人。日语只好译为“御互”。还有二人称、三人称的尊敬语等问题。2)指示代名词。北京官话指示代名词近称和远称,语音上就特别,比如这,读 zei 。近称和远称内涵比较复杂。3)疑问代名词。比如“那”,读为 nai ,把去声变为上声,表示疑问“这两个哪个好?”指示代名词加上接尾音“么”,表现了副词的意义。变为疑问副词。在指示代名词后加上“儿”,有的指示场所,比如:这儿。还有的就是疑问副词,比如:哪儿。

第五,动词。北京官话动词活用时态。1)“现在形”,动词后附着助动词“着”。比如“我们躺着”。在语音上,“着”有阴平和阳平两读,区别附着和独立两个意义。2)过去形。动词附加助动词“了”,比如“客走了”“你错了”表示过去的动作。还有表示未来的状态,比如“他快来了”。“了”也有三读,转换时, $la\ le\ liao$ 意义不同。熟语构造限于语尾音“了”,比如:开船——开船了,起了一个类推作用。3)未来形。北京官话助动词“要”,位置不同,意义不同。比如“他要回去”,表示未来行为。而“现在我不要”,与未来行为无关。

第六,助辞(词)。现代北京官话助词主要有:的、把、罢、么、哪、啊、呢。“的”用在形容词之后省略名词,如“白的好”,等同于“白纸好”;动词之后加“的”,如“看门的”等同于“看门人”;用在动作之后,比如“说的快”,明清戏曲还有“说得快”,发音不同,用法一样;用在“儿”之后,比如“快快的走”,助词“的”构成副词独特形式。表现过去动作的动词“是”,也表示动作完了之义,比如“我是坐车来的”,也具有助词性质。

(四) 口语和文体语

汉语口语一般称为“俗语”,把文体语称之为“时文”。“俗语”和“时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时文是书面古体之文, 俗语容易读, 音节数量明显更多。时文以单音节词为多, 俗语以双音节和多音节词为多, 比如: 在北朝鲜, 俄兵百名之内, 有三四十名, 着朝鲜之服(时文); 在高丽北边儿, 俄国兵一百人里头有三四十个人, 穿着高丽衣裳(俗语)。后藤朝太郎解释说, 俗语诉于耳的是听觉, 而时文诉于眼的是视觉。俗语语言通行区域有限, 而时文超越时空, 都能通用。北京官话属于特殊的宫廷语, 是“中流(层)社会”的用语。有的口语是低俗的, 属于下流(层)用语。有些俗语逐渐进入了时文中来, 二者不能截然分开。

(五) 汉语方言

观察方言的发生, 主要从这样的几个方面入手: 1) 自然地理与语言的关系; 2) 气候和语言的关系; 3) 行政上区划和语言的关系; 4) 历史风俗和语言的关系; 5) 社会阶层和语言的关系; 6) 食物和语言的关系; 7) 发音机理和语言的关系; 8) 心理和语言的关系; 9) 国民性和语言的关系。

关于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 从音韵、单词、语法等角度, 中国大略可以分为几个大的方言区。后藤朝太郎认为, 与其说通行南方的中国语是汉语的方言, 不如说, 是不同的“国语”。南方之地, 在同一帝国管辖之下, 所以把它看做是同一母语的方言。但其虽称为方言, 却隔绝很深, 具体的语音差异很大。相关例子如罗马语系统的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 有方言之别。葡萄牙和西班牙政治上各自独立, 却共有“国语”。汉语方言通行区域大致是: 官话在中国五分之四的地域通行, 方言在中国五分之一的地域通行。汉语方言研究只有一些零星的成果, 比如语音, 仅仅停留在单词语音分析上。在语法上, 只是就几个代名词作了初步的探索。要获得更为科学的成果, 不花费几十年的功夫是不行的。

(六) 浙江方言

第一, 上海方言。与北京官话相比, 其语音的浊音特征突出而发达, 如 b\ d\ 之别, \ d\ dz\ z\ v\ 也存在。上海俗读音有非浊音的字, 比如鼎、贝、骨等。上海音有读书音和俗音的区别, 存在着入声。

第二, 宁波方言。它与上海方言很接近, 有浊音, 和北京音一样, 有 [ŋ] 尾, 和北京音 [n] 尾对应的比如“文、本、进、云、民”等字, 完全一样是 [ŋ] 尾的如“名、上、兄”几字。“九、竟、倾、家、金、交、甲”在北京、宁波, “语头音”变为 [tɕ], 而上海、南京还是 [k]。“甘帽更刚”四字“语头音”则全都读 [k]。

第三, 温州方言。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温州与宁波、福州虽然相邻, 但方言区别很大。可注意的是, 语尾的变化和消失。北京 [n], 温州读为 [ŋ]。而“三蓝含担间慢关”, 收 [n] 阳声尾字, 变为阴声韵尾字。根据观察所知, 从语音来看, 浙江方言浊音很多, 上海存在着入声 [k] 尾; 北京官话 [n] [ŋ] 两尾, 在这里只有一个 [ŋ] 尾, 浙江南部方言, [ŋ] 尾省减。

(七) 福建方言

第一, 福州方言。被认为是中国南部方言中最难懂得的方言之一。特点是: (1) 缺少 [f]。比如非、福, 在温州、上海、广东方言中都是 [f]。(2) 有浊音, 但不是太多。(3) 福州方言语尾音(韵尾), 有入声尾、鼻音语尾。入声尾与厦门、广州、朝鲜汉字音相比, [k] 突出, 缺少 [p]、[t]。厦门方言鼻音语尾 [ŋ]、[n]、[m] 在福州合并为 [ŋ]。

第二, 厦门方言。(1) 浊音不是 [g] 和 [k]、[b] 和 [p] 的关系。北京音 [w] 声母变为 [g]。比如外、五两个字。北京话 [y] 变为 [g], 比如言、语二字。[b] 和北京音 [m]、[p] 对应。北京文、万, 厦门读 [b]。物、问声母为 [m], 分、福、方、肥声母为 [x]。(2) 韵尾, 比如入声韵尾 [k]、[p]、[t] 俱全。鼻音语尾 [ŋ]、[n]、[m] 俱全。(3) 厦门的“本地人”, 也有读书音和俗音的区别。比如茅 (b\ x)、糠 (t\ t')、虫 (t\ l)、篮(韵尾 m\ a 之分)、摸 (o\ ŋ) 等。

第三, 汕头方言。汕头行政上属于广东, 但在方言上属于福建。后藤朝太郎认为, 汕头存在着高的内鼻音(今天称之为鼻化), 比如官, [kwā], 其他像天、经、行、痛、坛、真。鼻韵尾和厦门相似。入声韵尾 [k]、[p]、[t] 俱全, 很整齐。

(八) 广东方言

第一,广州方言。北京音[x]读如[f]。送气的[k],读如[f],比如快、苦。北京音[x]读如[w]。北京音如、热、日字[z]读如[i]。鼻音语尾[ŋ]、[n]、[m]俱全。入声韵尾[k]、[p]、[t]俱全。后藤朝太郎认为,广州音和日本汉字音很类似,但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日本汉字音中的哪一类。实际上,指的是日本汉字音的汉音一类。

第二,客家方言。分布广东嘉应等地。与广州方言有差别,但在韵母元音、入声及鼻音韵尾上与福建厦门方音有更多的关系。以“札”为例,北京[tsa]、客家[tsat]、广州[cat]、厦门[tsat]、福州[cak]。入声韵尾[k]、[p]、[t]俱全,以及鼻音语尾[ŋ]、[n]、[m]俱全,基本一致。

(九) 北清中清南清方言比较

关于音韵。北京官话,没有入声韵;鼻音韵尾没有[m];语头音(声母)浊音很少;存在[ki][ky]是通则。即存在着齐齿呼和撮口呼。有四声之别。后藤朝太郎对浙江方言、福建方言、广东方言声调类型作比较。声调类型数量,比如广东语9、汕头语8、泉州语7、厦门语7、漳州语7、福州语7、客家语6、上海语8、南京语5、扬州语5、北京语4、四川语4、贵州语4。从音韵特征比较,入声韵尾、鼻音韵尾存在明显差异。

关于人称代名词。北京官话第一人称代名词:我、我们;第二人称代名词:你、你们;第三人称代名词:他、他们。各地方言人称代名词:上海方言,第一人称代名词单数是我,复数是我你(呢),嘉定县则是我侬、吾侬;第二人称代名词单数是侬,复数是侬那,嘉定县则是尔侬、你侬;第三人称代名词单数复数都是伊其,嘉定县则是渠侬。宁波方言,第一人称代名词单数是我,复数是 ahla li;第二人称代名词单数是 ng、noli,复数是 ng、lali;第三人称代名词单数是 gyi,复数是 gyi lalh。其他还介绍了福州、厦门、汕头、广州、客家等人称代名词情况。人称代名词后加表示属格助词,比如北京官话,我们的、他们的。

关于基本数词。论著分别就基本数词的语音、词形进行比较。

(十) 中国语和同族语比较

第一,苗语和汉语。苗语与汉语属同一系属语言。苗族分为花苗、白苗、黑苗、青苗、红苗、打鍊等类。从基本数词发音入手比较苗族内部语言差异。还进行北京话、广州话与苗语、汉语和苗语对话体的比较。

第二,安南语与汉语。后藤朝太郎引用了南条、高楠两位日本学者的成果进行论述。关于越南与汉语的关系,人称代词方面,比如汉语自称(我、go、wo)、越南语自称(我、岛 to)、汉语他称(ni、li、i)、越南语他称(汝、mei 迷)。他还进行了交趾音、东京音、南清音、安南音、广州音、福州音、北京话、广州话、越南土音、越南汉字音的比较。作者认为,这种比较有利于拟定汉语古代语音系统。几年后,法国学者马伯乐、瑞典学者高本汉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音韵学时,就把安南汉字音作为拟测汉语中古音的重要依据之一。^[5]

第三,藏语和汉语。作者认为,藏语和汉语都是单缀语,关系十分密切,比如助词发达。在印度中国语族中,藏语和汉语是最为重要的。作者将藏语语音、汉语语音(南方语音)、日本语音进行了比较,认定语音十分相近,说明藏语语音对考订汉语语音史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在“本论”中,后藤朝太郎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汉语研究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对汉语性质的认识是核心,确立现代汉语标准语,注意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和语音特点,以及汉语在印度中国语族中的显著地位和作用。研究思路十分清晰,就是以比较为基本原则,突出汉语特点,建立起系统的现代汉语研究理论和方法。

五、《现代中国语学》“结论”基本思路及理论意识

“结论”是作者对现代汉语学理论体系的抽象和概括。主要观点有:

(一) 现代汉语的发展趋势

把现代汉语放到乌拉尔阿尔泰语族、印度中国语族、印度欧罗巴语族视野范围考虑,就会发现,三大语族差别很大,最具代表性的是汉语。汉语的基本类型特点即是单缀语形式。研究汉语单缀语发展的趋势,以北京官话为最佳分析对象。汉语单缀语,经历了由“纯单缀音(单音节单纯词)式”向“纯多缀音式”(多音节单纯词)进化的过程。比如“纯单缀音式”渐次减少,而“纯多缀音式”增多。“二缀音”“三缀音”不断出现,比如北京的多音节单纯词俗语词构成就是如此。究其原因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具体来讲,现时汉语,逐渐脱离了“纯单缀语”状态,而是接近了“添着语”(黏着语)形式。更明确地说,汉语已经接近了乌拉尔阿尔泰语族的形式了。这是“在语言上,由历史的接触而造成的结果”。^[6]请注意,后藤朝太郎用了“语言接触”概念。

他解释道“按语言观察的一般情形,性质完全相异的语言,如果接触,从语言的内部构造上看,接受彼此影响的很少见。但汉语近时呈现的现象,很像道尔喀或者马基亚尔(匈牙利)语言。它本来属于乌拉尔阿尔泰语族,由于历史上的地理关系带有欧洲语的色彩。”“究竟为何如此暂且不论,今日汉语北京官话存在着很多‘纯多缀音式’(多音节单纯词),很像‘添着语’(黏着语)形式,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北京官话之外,比如南清方言,以及安南、暹罗、西藏等语言,是否也具有“纯多缀音式”情势,因为没有作详细而充分的调查,还不能过早下断言。但可以从地理分布和交通关系上看出基本趋势来,比如“纯多缀音式”,依照南清、中清、北清的顺序,越向北越发达。

(二) 从语言学角度观察汉语

后藤朝太郎谈到,西方,乃至东洋的一般语言学者和历史学者,都抱有这样的观念,即汉语在世界诸语言中,可以定性为幼稚而单纯的。语词并列而孤立,其构造千篇一律。这是习惯于用屈折语,即表现语尾曲折语法关系的西人之眼,或者用如此相关的理论加以责难。他批评说,也许与吾人以东洋人特有的注意力有关,西洋人是带有一种明显的自尊主义倾向来论及这个学术问题的。大凡万国之人,应该摒弃这种情绪,而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实事求是的观察,这是学术界的“常道”,更是学术研究的“罗针”(指南针)。西方有人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西方,东亚文明不过是西方文化的余光,十分牵强附会,没有科学依据。从语言学上说,有人断言,孤立语是最低级的语言,而曲折语则是高度的发达语言,添着语(粘着语)则是处于向发达语言曲折语过渡性状态的语言。人为地设定了语言类型的三大发展阶段,汉语属于印度中国语族,是孤立语,为原始的低级的语言。乌拉尔阿尔泰语是添着语,属于次一级的语言。印度欧罗巴语属于曲折语,达到了高度发达阶段。这个看法以シェライハ-(施莱歇尔, 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为主要倡导者。^①

他认为,这种观点的误区在于混淆了文明发达程度和语言发达程度的关系。大凡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印欧语具有很多的语法形式,比如复杂的语尾形式,汉语没有这种形式,却有孤立的语词关系,依据语序(woid-order)表示语法,这是汉语的特色。以印欧语特色作为衡量所有语言是否发达的标志,是一种带有明显感情倾向的主张。如果以此论述,那么,把汉语作为衡量标准的话,汉语却以特有的精炼形式来表达思想,传达感情,是不是可以认为,印欧语语法具有如此复杂的语尾形式是没有必要的?印欧语是不是就是低等的语言?

从与印欧语比较来看,汉语所具有的特色是:因为是单缀语,同音语绕多、四声、区别送气与不送气;二缀音、三缀音等,也是其发达的标志。事实上,英语正在明显具有了汉语的语序形式,而汉语助词发达,也明显带有乌拉尔阿尔泰语的形式。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这是不是英语这种高级语言形态正在向低级语言形态退化,而汉语这种低级语言形态正在向高级语言形态进化?可以理解

^① 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 德国语言学家。他认为一个语系就好像一棵树,印欧母语是树干,子语是树枝构成一个谱系树。谱系树理论的提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大进展。一个语系从假设的原始母语逐步演变到各种语言的历史过程一目了然地展现了出来。

为,语言发生变化,具有了遵循“语言循环”大原则的基因,并不见得有所谓退化和进化之别。后藤朝太郎呼吁,对汉语的观察要抛弃单纯以“形态”为标准的印欧语“旧套”做法。他采取语言学“心理学观察法”观察汉语,不局限于汉语语法形式,还注意观察“意义”表现是否充分。单缀语类型的语言,在文学上的表现力,决不逊色于曲折语类型语言。由语言的表现和心理作用之间关系观察,汉语音韵组织,巧妙、复杂而精确的构思,比起其他的单缀语来,更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三) 对汉语有必要进行历史的研究

后藤朝太郎认为,对汉语仅仅进行现代这个平面的研究,只能是止于表面现象的理解。研究“无数的变态”,各地方言的分布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知道的只是偶然性的内容,是“知其然”的研究。如果要“知其所以然”,必须进行“潜在的历史由来沿革”的研究。现时中国汉语北方语和南方语具有明显的差别。如果追溯历史的话,黄河流域至少在一千年前所具有的古韵现象,这通过广东方言得到印证。为何中国古韵在中国南方和安南地方存在,而在中国北方不存在呢?除了自然地理上的原因,与历史发展也有关系。对语音、词汇、语体的差别,联系历史是可以究明的,比如北京官话口语和“文章语”(书面语)相隔很大。但“文章语”(书面语、时文)在历史上,脱却语言的地方性,通行于整个中国,具有绝对的融通力,是语言的多样化造成的结果。依此理论观察,汉语新旧语言状态,宛如地质上的“层”,相互叠加。随着时代的推移,新层覆盖旧层。南方相当于古世代地层,西方的相当于元始代或者叫太古代。比如藏语,其古老音韵形式很像太古代的千枚岩期。

如何对汉语进行历史的观察?后藤朝太郎认为,有一些必须思考的问题:一是汉语句法经由怎样的历史径路到达了今日?二是语汇如何由单缀音形式发展到今天的多缀音形式?三是汉语音韵发展到了今天的北京官话语音形式,其由来如何?四是从现代地理上可以看到的汉语千差万别,那么,由纵向观察,它们和历史上的汉语关系如何?如何进行比较?五是先秦汉语和汉魏六朝汉语有那些不同?隋唐汉语和宋末元初汉语有那些不同?元杂剧表现的汉语和现代的汉语如何进行比较?六是中国历朝文学所受当时语言影响的痕迹如何寻求?七是邻国语言或文学所受汉语影响情况如何?后藤朝太郎强调,本研究看起来宏大,但很多看法属于“皮相”之见,浅薄而杂驳。如果要达到臻于完善境地的话,就要和印度欧罗巴语族进行全面的比较。此类研究还没有人做过,期望将来有人进一步裨补缺憾。

六、《现代中国语学》的学术价值及意义

一百多年前,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建立了具有完整系统的现代汉语学理论体系构架,这在世界范围内汉语语言学史研究上是第一次,对汉语语言研究由粗放到精致、由零散到集中、由不自觉地自觉过渡十分关键。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评估它在世界范围内汉语语言学史研究的重大价值。

《现代中国语学》的重要意义:一是日本学者第一次有意识地运用近代西方语言学理论系统地研究清代汉语,构建清代汉语学科体系,从而丰富了清代汉语学科基本内涵。二是建立了一整套研究清代汉语的理论与方法。比如对汉语的性质、文字和言语、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文言和口语、现代汉语的标准语、北京官话、汉语方言、汉语和同族语的比较、现代汉语发展趋势等问题加以关注,前瞻意识很强,完全超越了前人。三是就清代汉语具体问题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看法。如该书对孤立语的认识有着正确的研究态度,而不是人为地设定语言类型的发展阶段;又如作者认为研究现代汉语应该以口语为主,并把北京官话作为标准语,这就从理论上确定了研究的基调。四是在进行口语和文言、现代汉语和同族语比较过程中,使读者真切地认识到了北京官话口语、现代汉语的特点,对认识汉语的个性特征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后藤朝太郎在“结论”中所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要。比如把握现代汉语的发展趋势,从语言接触角度认识具有明显的前瞻性。今天许多学者研究汉语,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行进的。比如陈保亚

《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等著作,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语言接触理论体系。^[7]他对西方学者以“形态”为标准的“旧套”做法,以及由此带来的偏见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在今天也还有其现实意义。如何进行汉语历史的研究,后藤朝太郎提出了7个问题,有语法、词汇、语音等具体的汉语要素历史研究问题;也有北京官话形成过程、汉语历时和共时比较、汉语史“分期”、文学文体与语言的关系、汉语在东亚的传播和影响等问题,非常具体而现实。就是在今天,它们也是前沿性的学术问题。严格说来,一百多年来,我们汉语学界同行尽管作了很大的努力,仍然还没有解决好这些问题,这确实是令人深思的。

注释:

- [1][6]后藤朝太郎《现代中国语学》,博文馆1908年发行,仓石武四郎《日本中国学之发展》,杜轶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9、267页。
- [2]钱婉约《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4页。
- [3]李无未《日本汉语音韵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10页。
- [4]刘家鑫「後藤朝太郎・長野朗子孫訪問記および著作目録」,『環日本海論叢』第14号、1998年、28-47頁;三石善吉「近代日本と中国-27-後藤朝太郎と井上紅海」『朝日ジャーナル』14(32)、40-47、1972年8月11日;石川泰成「後藤朝太郎の中国学の構想」『九州産業大学国際文化学部紀要』第19号、1-8頁、2001年。
- [5]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
- [7]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于冬梅《试论清末北京官话常用中日同形汉字词——以〈日清会话辞典〉为依据》,《东疆学刊》2013年第2期。

[责任编辑:廖哲平]

The Initial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 Theor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Japanese Monograph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1908)

LI Wu-wei, LI Xun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1908) by Goto Asataro is the first monograph in Japan and even the worldwide to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a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 theory. Opposing the tendency of valuing practicality and underestimating theor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researchers have to systematically build a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 theory in order to make Chinese study a real scie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ook involv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the status quo of Chinese. The Principal Argumentation, which is the core part of this book, probes into standard Chinese, the phonology and grammar of Peking Mandari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and the distrib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dialects. The Conclusion discusses the trend in Modern Chinese and the necessity of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assess its academic value, influences and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in the world, so as to inspire us today to build up a scientific Chinese linguistic theory.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1908), Japan,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 theory in the Qing Dynasty,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